

旧事

难忘的半工半读岁月

陈开尧

1964年8月25日,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《坚持半工半读的方向》的短评,肯定了半工半读学校这一国家提倡的新事物,培养了既能体力劳动又能脑力劳动的新人。

党报的号召迅速传开,各地纷纷行动。当时正值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时期,各厂矿企业迫切需要大量中级技术人才,而像这样的职业学校却很少,短评发表后,政策宽松,只要工厂有师资、校舍和资金,就可以办学,学生毕业后由工厂自行安排就业。我记得,当时株洲的厂矿企业相继创办了重工技校、轻工技校、焊接技校、化工技校等十余所技工学校,市里还成立了工读办,统管全市的半工半读学校。经过全市统一考试,16岁的我被印刷工业中等专业学校录取。到校后,我们实行半工半读,一边学习,一边劳动,面向生产,服务生产。虽然条件艰苦,但那段充满深情的半工半读岁月却叫我难以忘怀。

●班上的缝补组

1964年秋季,位于解放西街的印刷工业中等专业学校开学,为了解决自给自足的办校经费和生活开支,学校组织的盈利劳动较多。劳动时同学们的衣服挂破了,鞋子穿破了,不会缝补的要拿回家去补好,很是耽误时间。劳动委员晏金莲同学看到了,便与几个女同学自发组织了缝补小组,经常把同学们挂破了的衣服、穿坏了的鞋子拿过去,再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给同学们缝补好,第二天又送还给同学。十几岁的女孩子缝补鞋,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。但那时,人们都自觉自愿地做了。由此,这种良好的助人为乐的风气,逐步在同学们中推广开来。

●多出来的饭菜票

第二学期开学后,热火朝天的盈利劳动依然不停,因劳动强度大,饭量也大。然而,一个月只有29斤饭票和11元菜票,吃不饱的情况时有发生。直到有一天,全班男同学突然发现自己的课桌里多了5斤饭票和2元菜票,大家都不知道这些票从何而来。后来才得知,是班干部刘丽美组织全班女同学进行的一次饭菜票募捐。她们看到男同学一个个普遍吃不饱,便悄悄地组织全班女同学捐出一部分饭菜票给男同学。可是在那个吃饭计划定量的时代,女同学也吃不饱呀。女同学宁肯饿自己,也要从并不多余的饭菜中省下的一部分捐给男同学,令全班男同学无比感动。

●化险为夷

1965年夏季,为了锻炼身体和活跃生活,学校老师组织学生乘坐轮渡前往湘江河西游泳——因为西岸水质好且沙滩平整,同学们在清澈的河水中尽情享受戏水的乐趣。当时,男生大多会游泳,然而女生却全都是旱鸭子。

带队的单老师决定编写一个快速入门的游泳训练计划,专门针对女同学。经过十多天的训练,女同学们基本上都学会了游泳,有的甚至学会了仰泳。然而,就在大家兴致高涨的时候,却差点引发大祸。

原来,那河岸沙滩本来是平整的,但不知何时偷沙的船只在这片水域底下挖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。刚刚学会游泳的女同学们在江水中尽情嬉戏,不料,黄良萍、晏金莲等三位女同学不小心掉进了这个深坑,旁边的男同学紧急呼叫:“老师快来救人!”单老师听到后吓了一跳,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冲到事发地点,潜入水中看到黄良萍还站在水底,头朝两边晃动,还没有呛水也没跌倒。单老师赶紧抓住她往岸上拉,她一出水面就惊慌大叫。如果再迟一分钟,就会缺氧沉入水底!

其他男同学也迅速赶来营救,幸好一只大船经过,大家帮助遇险的同学抓住船边游回岸上,这场惊险的事故总算过去了。

●冒名演节目

上世纪60年代初,株洲市的职工文艺活动非常活跃,全市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大型的职工文艺汇演。汇演结束后,还要对节目进行评比奖励。厂工会领导觉得在职工文化水平低,难得拿出像样的节目。于是灵机一动,把这个任务交给半工半读学校,让学生去演。学校接到任务,立即选节目,挑演员,最后选定的节目是表演《这一仗打得真漂亮》,来自电影《洪湖赤卫队》中的一个片段。演员则敲定了八位男同学。同学们在课余时间抓紧排练,不辞辛苦,把每一个细节都排练得很周到,女同学则提供一切后勤服务。

1965年春节前夕,全市职工文艺汇演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,我们的节目在正式的演出中得到了评委的肯定,居然得了奖,厂领导自然高兴。而那些评委并不知道,这个节目并不是职工演出的,而是一群半工半读的学生演出的。

半工半读的生活让我们收获满满,仅一年时间,学校就做到收支平衡,学习也没受影响。省工读办派专人来校了解情况,盛赞学校取得的成绩。

1965年9月1日,《株洲日报》以整版篇幅推介了“印校办学经验”。1966年5月,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,教学被迫中断,学生基本上在车间顶班劳动。1967年底,湖南省计委下文,将两个班的51名学生全部转为国家正式在编职工,学校停办,我的半工半读生涯就此结束。

贺家土的清新时光

欧阳光宇

芦淞区靠北有个地方叫贺家土,此地名源于从江西迁居的一贺姓大户人家。我虽不是株洲的原住民,但在株洲住了40多年,也算是老株洲人了。若让我选一个词来描述贺家土,我会选“清新”二字,因为贺家土有两个“园”,一个是神农公园,另一个是文化园。回首我自己的成长轨迹,神农公园映照了我的童年时节,文化园则映照了我的青年时光。

199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,我曾为一个老干部座谈会做会议记录,听已故的老市长吴占魁说起株洲的历史。他说株洲建城市时,刚好有苏联专家来到这里,他们来自一马平川的西西伯利亚平原,面对崎岖不平、身处丘陵地带的株洲,感叹道:你们这儿怎么能建城市哟。斯时斯境,按照苏联专家最初规划,是以贺家土为中心,建一个五到六万人的城市。

我至今也不想说苏联专家的格局太小,那种事后诸葛亮的话是不负责任的,我知道的贺家土,曾是株洲城市建设的打开地之一,是最早设想的建城“初心”,虽然现在中心广场建在了离贺家土往南约两站路的地方,若说其是一个城市证书的正本,那么贺家土则是中心广场的副册。

现在的神农公园是株洲建市以来最

早的公园,株洲第一工人文化宫便在神农公园内,与公园相关的路叫公园路;紧邻着神农公园的是株洲的老体育馆,与之相关的路叫体育馆,这都是贺家土为株洲人熟知的地方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,我刚调到株洲来时,在星期天早晨,常带着我大哥在公园里习练武术,并通过武术交友和切磋技艺。我二哥那时是家里的“秀才”,从我们月塘小学毕业后考入株洲市二中,当时二中校址(现为市八中所在地)在贺家土辖区内,那会儿刘兰芳讲的评书火遍全国,二哥为了听评书,中餐后常走出校园,到学校附近的贺家土百货商店蹭评书听。

还是觉得神农公园照拂过株洲几代人的童年,我儿时,这公园名字叫株洲公园,进门收取门票5分钱。学校组织我们在公园的人工湖上坐过游船,舅舅带我坐过据说是331厂生产的游艺飞机,那可没有坐游船那么优越哉游哉,游艺飞机绕着圆盘直冲下来,吓得人紧抓扶杆神情紧张,然而,多年以后,知道童年回不去,若用现在的“画中画”来表现坐游艺飞机的场景,在吓得七零八落的表情之上,还可以加一层孩子们嘻嘻哈哈的影像,有清新的笑颜,在画面中回旋。

我年少时株洲公园更名为奔龙公

园,公园建设路的围墙顶端,做成规律的半圆形波浪状,有“奔龙”的意象,围墙用片柱支撑分隔,虚实相映,片柱的格栅,透出公园诸多的风光,在围墙外一路走一路看,颇有点风景这边独好的味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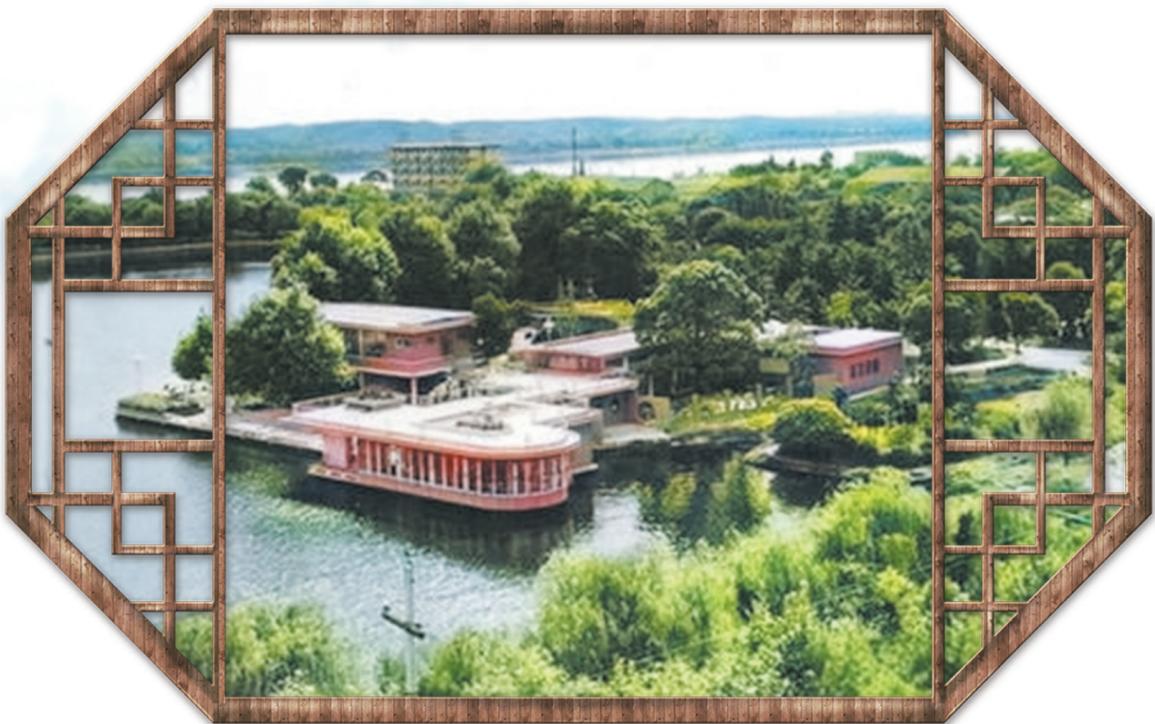
那会儿我大致是上初一,与几个同学来奔龙公园玩,公园内当时有不少用钢筋水泥做的动物或景观,供人观赏和拍照用。我有个比较潮的同学,带了个塑料照相机,我们与“滚龙抱柱”和“熊猫”的水泥景观互动时,同学各拍摄一张;彼时我以为这是幼稚好玩的东西,影像留存不了多久,但时间过去四十年,虽然有张照片在拍的时候背景跑光似的空白了一块,但人像却是清楚的,而且成像的部分,至今都没有模糊褪色。

我读高中以后就没怎么跑奔龙公园了,我开始跑贺家土的文化园,当时好像还没有将这里唤做文化园,我跑这里是奔着株洲图书馆去的,我早逝的大哥在图书馆办的借书证转到我手里,当时是纯粹的纸质阅读时代,没有手机,家庭座机电话都还没有普及。我一有空就去图书馆借书看,当时骑自行车从荷塘区文化路9号出发,骑至纺织路再拐到图书馆,要20来分钟,这是电脑、手机未覆盖之前,我的纸质阅读最专情的时间。

生活总在进步,到本世纪初,发现此处越变越漂亮了,因为图书馆和群艺馆都在这里,所以这里被正式命名为文化园,还精心设计了Logo;朝北建了高大的正门,东门一块巨大的卧石上,有名人为文化园的篆刻版题字,园内的湖水治理得清澈,紫玉兰在石板路旁绽放报春,美艳的海棠花在阳光下喜悦地开放。

我小孩出生后,又开始跑公园了,那时的奔龙公园已更名为神农公园,公园的人工湖上还是能够坐游船,我童年坐过的、吓得我神情紧张的游艺飞机不见了,但别的游艺设施几乎把公园塞满,满得甚至招至批评,说公园不注意审美留白,被游艺设施闹得有点乱,但孩子们喜欢,打气球、套圈、蹦极……我小孩几乎在里面玩了个遍,直到他上小学了,放学后还不忘去神农公园玩一趟过山车。

与此同时,文化园也热闹起来,除了个体出租车电瓶车以外,还弄了个让小孩脱鞋子进去,在里面可以玩半天的儿童游乐场,这时候,守在外面的妈妈们就可以偷闲话家常、聊天。当然,文化园的宁静和书香气还是其主要的氛围,图书馆也提供了孩子们的课外书籍,逢节假日,带小孩进去看一个课时的漫画书,也是贺家土留给人的清新的笑颜。

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奔龙公园(现神农公园)一角。AI上色修复/左骏

记事本

关仔木匠

武开龙

关仔姓吴,是远近闻名的老木匠。因为乡下人习惯将名字和职业连在一起叫唤,所以男女老少都称他“关仔木匠”。据说,年轻时候的关仔木匠牛高马大、四肢修长、阔肩窄腰、健硕挺拔。这形象气质让十里八乡的男人羡慕嫉妒,让女人朝思暮想。

关仔木匠是我爷爷的姨父,小时候常常跟随爷爷去他家走亲戚、吃年夜饭。印象中,我从没叫过他,爷爷教我的称呼有点拗口,小孩子叫不好,就干脆不叫了。其实,不叫他最重要的原因是怕他。那时,关仔木匠应该有八十多岁了。他不苟言笑,牙齿洁白整齐,皮肤白里透红,和刚出生的婴儿差不多,脸上似乎也没几条皱纹。一头闪着银光的白发梳成大背头,不像其他老人千篇一律的小平头。比他年纪小的人都弯腰驼背,拄着拐杖。关仔木匠却眼不花、耳不聋,腰板笔直、健步如飞。他中气十足,只要一说话,就是轰子都会吓一大跳。

我听了许多鬼故事,小脑袋里总觉得关仔木匠不是凡人,总喜欢将他和妖魔鬼怪联系在一起,因此,我从不敢和他单独待一秒。甚至爷爷要我去喊他到我家吃个饭,我都只站在他家大门口大呼小叫,只要他应了声,我扭头就往家里跑。

有意思的是,偏偏关仔木匠喜欢讲故事,我喜欢听故事。怕归怕,关仔木匠的故事总是像磁铁一样深深地吸引着

我,只要他一句:“那时候……”我的脚就抬不起来了,竖起耳朵,大气都不敢出,缠着大人定在那里。他讲半天,我听半天;他讲一天,我就听一天,吃不吃饭、睡不睡觉都没关系。

有一次,关仔木匠在我家做晚饭。完工之后,奶奶炒了几个好菜,关仔木匠开始喝酒。我心里想,今晚是个听故事的好机会,可关仔木匠一直喝到人家都灭了油灯,我的眼皮都打架了,都没有讲故事的意思。我终于熬不过了,爬床上。刚钻进被窝,关仔木匠一句“那时候……”让我顿时眼睛发光,睡意全无。

“那时候,我还是学徒,跟我师傅在地主长生家做猪栏门。完工那天,长生自己有酒有肉,先吃了。我和我师傅就一块豆腐打汤,一碗辣椒炒豆渣,一碟霉豆腐,一盘白菜。师傅很生气,又不好发作。吃完饭,天黑了,长生把门一关,睡觉去了。师傅空手走前,我挑担走后,没几步就到了猪栏旁边,师傅停下来,扯下罗布头巾,将一端递给我,要我放下担子站在猪栏里边,师傅自己在猪栏外边。师傅要我拉他进去,可我不管怎么拉,师傅就是不进来。”

“师傅做什么,不懂也不能问,这件事我一直是个谜团。半年后的一天,师傅叫我去长生家吃饭。这餐饭鸡鸭鱼肉堆盘满桌,师傅喝了两个二醉。长生满脸堆笑,央求师傅解咒——原来自从做了新猪栏门后,猪娃猪婆都不进猪窝,尤其是

猪娃,就是抱进去了也要逃出来。害得长生家的猪被贼偷走了好几头。酒足饭饱,等大家都睡了,师傅要长生关门睡觉,和我在猪栏边又做起了上次的把戏,只不过这一次我一拉,师傅就进来了。说也奇怪,第二天长生就托人带话说猪很听话,夸我师傅厉害。我这师傅呀……”

听完关仔木匠的故事,我思考了半天,这到底是什么原因?要是我家招待不周,今天完工的饭菜是不是就不能用了?要是关仔木匠下了咒,放在桌上的菜碗自己开裂了怎么办?猴子会不会夹不了菜?朦胧中,我还看到了碗筷在桌上跳舞的画面……最终,那晚我把屎尿在了床上。

还有一次,我端着碗正坐在大门门槛上吃饭。“那时候……”路过我家门口的关仔木匠的声音一下就把我的魂儿吸走了:“那时候,我刚出师,在张家家里做嫁妆。奇了怪,锯子拉不动,拉动了也拉不直;斧头砍不准,砍准了也砍不平;画好的榫卯斗作全乱了套。最后只能用洋钉钉,你说,我还有什么面子?最奇怪的是那天中午,青天白日,人家吃完饭就出门了,我一个人靠着墙抽烟。突然,从楼门上吊下一只脚,这脚那叫一个妙呀——笋尖般的三寸金莲。绣花鞋面,千层白底。鞋面是金银丝线,脚一晃一晃,光一闪一闪。我这人胆子大,跳上去想抓住这只脚,结果你猜——啥也没捞着!果不其然,张家女儿出嫁第三天就死了,唉,

多好的姑娘,我就纳闷了,我咋就不给张家提个醒呢?”

故事讲完了,关仔木匠昂首挺胸往家里走去,我的目光一直把他送到了山坳的那边。等我回头,满满一碗碗被大公鸡啄完了。

可怜我接下来的几天都不敢进屋子,进了屋子不敢看楼门,不敢看又偏要瞄一眼。还好,我终究还是没有见到一只穿着绣花鞋的三寸金莲在楼门口晃动。

“那时候,我带着徒弟在李家里建猪栏屋。一切停当,正在盖屋顶的茅草,徒弟站在猪窝前大叫:‘师傅,今天是凶日,患了千斤煞。咋办?’我一听,急了,这傻小子心里有事也不要说出来呀。好在李家走运,我脱口而出,‘千斤杀,千斤杀,有一千斤还不杀,还等一万斤呢?’李家这猪窝从此六畜兴旺,就是买头半死的猪娃也能长个四五百斤。什么原因?还不是我的断语接得好!”

这个故事是关仔木匠讲得最眉飞色舞的,也是我最听得最轻松的。我总是想,当时他怎么不说“万斤杀”呢?那多好,一万斤的猪那得有多大多呀,几个村子吃一年可能都吃不完……

关仔木匠讲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,这些故事五花八门、稀奇古怪。断后、止血、鬼手、点穴……更是无比诡异。当然,故事的真假我无法考证,也无须考证。很幸运,在我的童年的时光里,有一位名叫“关仔木匠”的老人曾经驻足!